

中日关系史论集

(上)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1985年增刊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编辑部编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前 言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在大连举行了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日本、美国、香港等地，近二百名专家、教授、学者出席了会议。

讨论会收到论文和资料一百三十余篇，其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学术之水平均有新的发展与提高，这对中国史、日本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颇有价值。我们将其部分论文汇集成《中日关系史论集》第四辑，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史的深入研究，促进中日友好的健康发展。

本书是由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齐齐哈尔师院学报编辑部共同编辑的。遵照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们尊重作者的观点，保持文章的结构和风格，只是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所限，难免有些疏漏和差错之处，请读者不吝赐教。有关甲午战争史的论文已汇成专辑，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蒙齐齐哈尔师院领导、科研处、学报编辑部、印刷厂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目 录

试论宋代中日关系·····	陈志贵 (1)
引人瞩目的珍藏·····	张立凡 (19)
——《芳洲文库嘉靖公牍集》的一个问题·····	陈文
日本石器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张玉祥 (26)
1894年的中日战争：美国的初步评价（论文提要） ·····	朱昌峻 (38)
试论明代中日贸易·····	于植元 冯兴盛 (42)
随使东瀛广结缘·····	孙淳夫 陈士聪 (56)
——黄遵宪与中日友好	
黄遵宪诗歌对甲午战争的反映·····	林熙源 (64)
论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董守义 (74)
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对华策略·····	冯祖貽 (8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梁启超与日本 ·····	刘福祥 赵矢元 (100)

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兴起

.....李 莎(111)

从大连港输出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大豆的掠夺

.....韩继红(121)

论甲午战争时期的丁汝昌.....梁世灿(135)

姚文栋——一个被遗忘了的清末日本通.....吴伟明(146)

中日之间翻译事业的几个问题.....谭汝谦(168)

论《汉报》的创办及其侵略色彩.....刘望龄(184)

试论宋代中日关系

陈志贵

两宋共存在了三百一十多年，北宋（960——1127年）大致相当于日本藤原氏包揽国家大权，天皇徒拥虚位的藤原氏全盛期（969——1068年），南宋（1127——1279年）相当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掌握国家军政实权的日本武家兴盛时期（十二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中叶）。两宋时期，尽管中日两国各自情况都很复杂多变，但彼此民间联系依然得到巨大发展。官方交往虽然不能与遣使时期相比，却也未尝中断，只是由于各自国情的影响，带有新的交往特点而已。此种情形在两国间的航海贸易、僧人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均有丰富的史实，足资说明。

一、航海和贸易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里，中国赴日的商船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宋商船一到日本，便依前代旧例，把商人安顿在鸿胪馆，供给衣食。因中国商船过于频繁，日本费用不胜负担，便从一条天皇时起，颁发了规定来日年份的官符。日本国内的《小石记》和《百练抄》等资料中，散见有开到日本的宋船因未得到官符，不得不载着原封货物而返航的事。为了避免遭受拒绝而返航，有的中国商人便假托遇风浪漂流到日本。中、日史料多有这方面的记载。①开到日本的北宋商

船虽然如此频繁，但由于当时日本实行着严格的锁国主义政策，开到宋朝的日本商船却几乎不见。即使偶尔有想前往海外的，也严加禁止与治罪。可是到南宋中期以后，在平清盛的主持下，日本解除了禁令，允许船只出国，中、日两国商船的往来便频繁起来了。

北宋中期以前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宋朝商船，一般是搭乘六、七十人的小型帆船，与唐末五代时期相同，大都从两浙地方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航到筑前的博多。到了北宋末期，宋船大多都从博多再往前走，遣入日本海，到越前敦贺停泊。于是博多、平户、坊津、敦贺等，都是当时日本繁盛的港口，有不少中国商人在这里修建住宅。敦贺还有专门接待宋商的松原客馆。

宋商船来日的时间，一般多是从夏季到秋初这一段时间里，以便利用西南季风。返航时间多选择仲秋或晚春季节，这又可以充分利用东北季风。因而在海上遇难的大为减少，航行时间明显缩短，一般不过一周内外。宋船到达日本进行交易的情况是：宋船进入博多后，先由警固所向太宰府报告宋船开到，太宰府即派府吏、通事等前来查问来日本的情况，责令提出本国的公文（由两浙路市舶司签发）、搭乘人员名单、载货清单等，申报京师。运来的商品，先由太宰府进行交易，然后准许普通人民买卖。南宋为了适应对日贸易的需要，在两浙地方相继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总称为两浙司舶司，几经合并，最后只保留了明州的市舶司（务）。自此，明州成为对日贸易独一重要的港口了。明州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所以当地多有通晓日语的译人。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记载：“顷在泰州，偶倭国有一舟飘泊在境上，

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日本商船在宋朝进行贸易，完全经由各贸易港设的市舶司（务）经管。外国船只一经入港，市舶司的官吏便前来检查载货，进行抽分、博买，然后听任一般商人交易。所谓抽分，就是按照货物的几分之几抽进口税。税率因时、因地、因货物的粗细（量重体大，价钱低廉的货物叫做粗色；量轻体小，价钱昂贵的货物叫做细色）而各有不同，但一般是抽取十分之一。博买就是收买的意思，用叫做本钱贸易府金，选购禁植物品（就是政府的卖品）等利润丰厚的货物，收买的数额多达货物的一半以上。②最初博买的货物和抽分的货物都送交中央，后来有时也把其中的一部分由市舶司卖给民间。宋代政府从海外贸易所获取利润的数额是很巨大的，仅“北宋初年，市舶收入总计达300,000至500,000贯，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二、三。”③

宋朝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锦、绫等）、瓷器、绘画、书籍、文具、香料、染料（苏枋等）、药材以及铜钱等。日本所以大量输入中国铜钱，一则因为日本在镰仓时期前后，商业发达，与东南亚诸国贸易用钱量太大；二则是日本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铜钱的大量内流，对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却造成南宋国内的钱荒，因此南宋政府严禁铜钱出口。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沙金、木材、水银、绵、绢、布等，此外还有泥金画、贝壳镶嵌的漆器、琥珀和水晶念珠、扇子、屏风等工艺美术品。从日本输入的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与造船，如南宋时，明州天童山千佛阁和阿育王山舍利殿的楹柱，都是用日本的木材造成的。日本的木材，价廉

物美，我国人民喜欢购用，老年人多希望买来作棺木。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说：“四明（即明州）、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十千（即三十贯铜钱），可得一佳棺。”⑤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单在南宋理宗宝祐时，庆元府（明州的改称）一年之间由日本商人输入的黄金总额约有四、五千两。⑥而南宋时期，中国黄金年产量也只有数千两。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志田不动庵先生对日本国的输出品，作了确切的介绍。日本输往中国的精巧美术工艺品在 988 年 然遣弟子向宋太宗奉表致谢时附的礼品单中，也都一一地列举出来了。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折扇），最负盛名，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欧阳修在其所写的《日本刀歌》中说：“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输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妖凶”⑨日本纸扇上的绘画多出自名家手笔，很受宋人赞赏，时人江少虞就曾赞颂说：“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赞青，纸如饼，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舫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者或不能也。”⑩

二、两国僧人的往来

两宋时期，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则主要经日本的僧人和中国的商人来实现的。

北宋时代入宋僧比入唐僧少得多，在其一百六十余年

间，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只有寂然、成算、祚一、嘉因、寂照、元灯、念救、觉因、明莲、绍良、庆盛、成寻、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仲回等二十人。其中著名的只有寂然、寂照、成寻等几人。入宋僧前往中国的目的同入唐僧大不相同。入唐僧都是日本国家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落后于中国而特地派出的学问僧或留学生。他们最大的目的在于求法，所以他们一经踏上唐朝土地，首先历访高僧，学习新政，力求带回新的法门在日本传播。而入宋僧却不是为了国家众生的利益前去求法，而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障，为了后世成菩提而去朝拜圣迹的。寂然自述渡海的志愿时就说：“寂然天禄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方贡之使而不遣，入唐间待商贾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寂然愿参五台山，欲逢文殊之即身，愿次诣中天竺，欲礼释迦之遗迹。”⑪又说：“得到唐朝，有人问我曰：‘是汝何人，舍本土朝巨唐，有何心有何愿乎？’答曰：‘我是日本国无才无行一羊僧也。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也。’”⑫

寂然是入宋僧中最先入宋，名声又最昭著。寂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官也。”⑬他出身于藤原氏，原是个有相当身分的人。幼时入东大寺为僧，从住在该寺东院的观理学习三论宗佛经，还从石山寺的元杲研学密教理论，升任大法位。983年8月，搭乘宋仁爽、徐仁满等回国船只赴宋。⑭同行者有成算、祚壹、嘉因等六名弟子。⑮寂然一行平安到达浙江台州（今临海县），10月获得准许进京，11月到达扬州开元寺，被安置在地藏院。此间，寂然登上天台山，朝拜了国清寺智者大师的真身堂，以后又参诣了鉴真和尚原来主持的寺院相州龙兴寺。12月达北宋的都

城东京（汴京），破例进谒太宗。他们来到宫中，首先献上了各种礼物，其中有铜器十几件，记述日本各种职官的《职员令》和自然自己编写的记载历代天皇名号的《王年代记》各一卷，《孝经郑氏注》一卷，《题在孝经释义》一卷（第十五）。⑩接着自然回答了宋太宗的垂问。⑪984年正月，自然得旨巡礼京中大小寺院，三月，奏请朝拜五台山，得到了批准，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此后遍历了洛阳、龙门等佛教圣迹后，再次回到汴京。自然著有《留宋日记》四卷，但已散失，无法看到。宋朝赐给了自然紫衣，并授予了法济大师名号。他在宋朝生活了约三年之久，公元986年7月，乘宋商郑仁德的船只平安地回到了日本。⑫跟随他的弟子们也同他一道归去。只有祚壹一人仍然暂时留在宋朝。在自然等人回国后的第三年（989年）正月二十八日祚壹也在求得《药师如来仪轨》抄本后回到了日本。

公元988年2月，自然归国二年后，又在他的推荐下，其弟子嘉因奉命乘坐宋商郑仁德船赴宋“奉表来谢”。在其表文里面写道：“……自然……。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咨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环奇。况乎金阙晓后，望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扉畴蒞，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教寺而优游。……伏唯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自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搔魂，不胜慕恩之至。……”⑬可见嘉因此行的使命是参诣五台山，并向宋朝献礼物，以感谢自然等在宋期间所给予的盛情接待。但它不是一般的礼节性的

答谢书，而是一位长久仰慕中国先进文化，夙愿以偿，倍受礼遇，深受教益的日本僧人，对中国极尽崇敬、热爱、赞美、留恋之情真意切的表露，也是讴歌北宋初年中日友好的史诗。跟随赴宋的然弟子中，成算是最好学的一个，他除与然一起拜诣各地圣迹、巡礼京中大小寺院外，还在洛阳太平兴国寺向印度僧人三藏法天学习佛语，造诣很深，归国后很快就被补任为阿闍黎。

净土宗是流行于唐朝的佛教宗派之一，首先把禅宗传入日本的是公元847年从中国回到日本的天台宗日本僧人元仁。到了十世纪初，净土宗在日本尽管已传布得相当广泛，但仍然还存在于台宗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对于传扬净土宗起了重大作用的，是空也、庆滋保胤、良源、源信等人。空也在平民百姓中颇有影响，庆滋保胤是笃信极乐净土的诗文大家，出家后号为寂心，写成了《日本往生极乐记》。良源是延历寺僧人，著有《九品往生义》。他的弟子源信，即惠心僧都，公元985年写成了著名的《往生要集》三卷。这部书是他从数千卷经论中精心挑选出的有关极乐往生的章节，重新加以系统总结而成的，也就是所谓的“极乐往生的理论与实际”，它奠定了日本净土宗的基础。公元988年1月，源信在去九州朝山拜佛时，在博多遇到了从宋朝前来进行贸易的商人朱仁聪，于是就委托他把自己所写的《往生要集》以及庆滋保胤的《日本往生极乐记》，带给宋朝的寺院。源信主张“佛教无国境”，因而热衷于同中国僧人的交往。宋商人把两部书送到了天台山国清寺，宋朝人闻讯欣喜异常，有五百多名善男信女，捐赠款项以为供奉。989年2月，宋商人周文德带给源信一封信，告知了这一情况。

后来，又应中国人民所求，源信请画工巨势弘高画了一张画像，送给了宋朝。

嘉因入宋之后的十多年没有入宋僧。直到1003年8月，才有源信僧都的弟子寂照从胆前出发赴宋，九月到达明州。同行的有元灯、念救、觉因、明莲七名弟子。^②寂照是寂心（即庆滋保禅）的弟子，本名叫大江定基。公元1004年，寂照来到汴梁谒见了宋真宗，被授予元通大师名号。以后他又到天台山游历，把源信委托带来的有关天台宗教派的二十七个问题，交给了中国的高僧。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后来捎回到日本。

寂照后来没有再回日本，留住在他的好友丁谓营建的吴门寺里，在宋朝渡过了三十一年，于1034年在杭州清凉山麓死去。“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扎。”寂照的七名弟子之一的念救，在1015年天台大慈寺重建时，曾做为“知识使”（专管筹集施舍的职务）一度返回日本。在得到了左大臣藤原道长等人的施舍捐赠之后，同年七月又从东京都出发入宋。此外，弟子元灯也从宋朝得到了紫衣和大师名号。其它五人则无所记载。

比寂照稍晚一些时候，又有源信的弟子绍良带着金字《法华经》入宋，三年后返回了日本。在那以后的大约四十年里，几乎没有一个入宋僧。直到1072年3月，日本大云寺僧人成寻，又带着赖缘、快宗、圣秀、唯观、心贤、善久、长明等弟子七人来到了宋朝。朝拜了天台山和五台山的圣迹，谒见了宋神宗，被授予紫衣和善慧大师名号。成寻一行从洛阳出发前往五台山时，神宗专门派出了官员陪同，并让他们乘驿站的马匹赶路。每到一处驿站歇宿，都备下美味佳肴

盛情款待。1073年10月，他派赖缘、快宗、唯观、心贤、善久等五人携带宋神宗致日本朝廷的国书和赠给日本朝廷的金泥《法华经》、锦缎和新译的四百几十卷佛经，乘宋商孙忠的船回国。宋僧悟本也同船来到日本。悟本原名陈詠，前后来日五次，通晓日本语言，因此曾担任成寻的通事，伴同朝拜天台山、五台山，后为成寻弟子。在赖缘等五名弟子回日本之后，成寻除再登天台山，在智者十二所道场学习秘法一年，又重游五台山，分别在五顶峰各作三十七日法坛修行之外，一直留在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一间专门给他的房间里读写经文，②1081年死于宋朝开宝寺，时年七十一岁。

自从南宋中叶以后，中日之间商船互有往来，极为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的入宋僧很多。这些入宋僧因时代变化，入宋的目的各有不同。大至可分为三类。③第一类是时代较早的入宋僧，他们和前代的旃然、寂照、成寻等一样，为了消灭自己的罪障，来生成菩提而去巡礼佛迹的。第二类是为了传习律宗而入宋的。如俊萇和他诸弟子的入宋，就是为了到中国各地广学律宗，以使律宗从萎靡不振，濒临失传的状态中振兴起来。属于第三类的是为了学习禅宗而入宋的，他们居这一时代入宋僧的绝大部分，禅宗从唐代起已经盛行，传到日本也已经有好几次了。但始终未兴盛起来。但禅宗在中国经历五代、北宋以后，日益昌盛，到了南宋更是盛况空前。因此，当宋、日交通日渐发达，僧侣来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中国禅宗就必然要影响到日本了。宋末约五十年间，是两国禅僧来往最频繁的时期。在传布禅宗的日本僧人中，以向日本传布临济宗、曹洞宗两个禅宗教派的荣西和道元的活动为最多。由于禅宗具有简明直接的风格，与武士

精神一脉相通，因而首先在上流武士中间传播开来，对于日本武家文化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

南宋后期，宋朝僧人来到日本的也逐渐多了起来。1246年，宋朝阳山无明慧性的法嗣兰溪道隆（大觉禅师）率同他的弟子义翁绍仁（普觉禅师）、尤江等数人去到日本，这是中国禅师赴日的开始。抵达日本后，从博多到京都，受到友人明观智镜的礼遇。在明观的建议下，又转镰仓。1248年12月，应执政北条时赖的敦请，住在栗船为常乐寺，并于第二年在这里修建僧堂，这是镰仓第一个道宗的道场。又于1253年11月建成巨福山建长寺，以道隆为开山第一祖。1255年2月，北条时赖又向一千多人募缘，铸一个大钟，由道隆作铭文，自署“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②从此日本才有禅宗的称谓。向来和天台、真言混在一起的禅宗，到此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道隆与北条时赖为发展禅宗，互相支持，为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共同地作出贡献。继道隆之后，在1260年，宋朝南禅福圣寺的僧人兀庵普宁来到日本。③他和日本东福寺的开山祖师辨圆都是中国径山无淮师范的法嗣，在蒋山和径山时和兰溪道隆也有深交。兀庵普宁先从博多到京都，在东福寺访问了法弟辨圆，然后接受北条时赖的邀请，来到镰仓。1261年继道隆之后，住在建长寺，他很受北条时赖的尊崇，由于北条时赖常来参见，到1263年10月16日便大有领悟，得到他的认可，他的声名随之大振，请求来住的僧人络绎不绝。但当北条时赖于1263年11月逝世后和台密僧徒妒嫉他的声誉纷纷诽谤的缘故，便于1265年留下了“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④的偈语后，返回了中国。普宁留日虽然仅五年，他的法嗣也只有东岩惠

安、南州宏海等二、三人，但因感化了执政北条时赖，使北条时赖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对镰仓武士和禅宗的结合影响还是很大的。1269年，径山石谿心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去到日本。到日本后，承道隆的退让，住在禅心寺，直到1288年死去，曾住过建长、寿福、圆觉等寺。较大休正念稍后，天童山的石帆唯衍的法嗣西涧士昙（敕谥大通禅师）应执政北条时宗的邀请，去到日本。士昙这时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还不能管理一寺，历游京都、镰仓之间凡七年，于1278年回宋。同年7月，兰溪道隆在建长寺死，执政北条时宗为了邀请可以替代他的宋朝高僧，亲自写下请帖，派法藏主和英典座二僧来宋。第二年（1279年）5月，无学祖元（佛光国师）应聘共到日本。祖元和辨圆、普宁一样，都是径山无准师范门下的高足。见到北条时宗的请帖，遂带领法侄镜堂觉圆、弟子梵光一镜等去到日本。住在建长寺，大力宣扬禅风。1282年11月，圆觉寺建成后，他被请为开山第一祖。和祖元一起来到日本的镜堂觉圆（大圆觉师），是天童山环溪唯一的法嗣，到日本后历住禅兴、净智、圆觉、建长、建仁等寺。^{②⑤}除上述者外，还有些到过日本事迹不传于后世的宋朝僧人。

三、文化交流

北宋承唐末五代的变乱之后，典籍严重缺损，急需从国外得到补充。如宋朝杭州奉长寺的僧人源清把自己所著《法华珠指》等五部七卷赠给比睿山。^{②⑥}同时要求回赠宋朝失传的智者大师的《仁王般若经疏》、《弥勒成佛经疏》、《小弥陀经疏并决疑》、《金光明经玄义》和荆溪的《华严骨

目》等书。日本天台座主觉庆因而抄写这些经疏回赠了他。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入唐僧便多数携带经疏前往，以补充中国的残缺。如高僧入宋晋谒太宗时，除了《王年代纪》和《职员令》以外，还进献了《郑氏注孝经》、《越王求经新义》。寂照赴宋时，也带来了许多典籍，其中有南岳禅师的《大乘止观》和《大方等持行法》，在宋都已散失，无法看到，所以天竺寺的沙门慧云是师遵式特地请求寂照刻印，并在序和后序中说明它的由来。④咸亨带来宋朝的天台、真言等经典达六百多卷，原想在长安青龙寺的经藏中校正《真言经仪轨》的讹谬，但在晋谒神宗时，就不得不把这六百余卷经典献了上去。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文化典籍的保存成就，所以欧阳修《咏日本刀歌》中说：“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经未荒，逸书百篇今犹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北宋时代日本的入宋僧，每年从日本带来经典补缺中国经籍的散佚，但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带回或托便船运回还未传入日本的典籍。在自然带回的物品中，最可贵的莫过于宋太宗所赐的印本《大藏经》。北宋根据宋太祖的敕命，从开宝四年（971年）起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在四川成都刻印完全部《大藏经》，⑤即《开宝敕版大藏经》。自然入宋晋谒太宗，恰在开宝敕版完成的太平兴国八年，所以太宗赐给他的印本《大藏经》，当是开宝敕版的初印本。自然带回的《大藏经》对当时佛典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自然还曾获得太宗所赐的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也带回日本。⑥他与入唐八大家一样，也有请

来目录（大屋德城：《日本佛教史研究》，转引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寂照虽死在宋朝，并因“商人重利、唯载轻货而来，上国之风绝而无闻，学者之恨在此一事”^③但也还通过遣送弟子回国或托搭商船等机会，把一定数量的中国典籍送回日本。成寻也终于没有回日本，但他在1073年遣送随从弟子赖缘、快宗、唯观、心贤、善久等五人回国时，带回很多新译经典。同年三月成寻居住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时，曾奏请赐予“然以后所出的新译经而获得准许，因而得到显圣印经院的印本新译经计二百七十八卷，《莲华心轮回文偈颂》一部二十五卷，《秘藏诠》一部三十卷，《逍遥咏》一部一十一卷，《缘识》一部五卷，《景德传灯录》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册，《天竺字源》七册，《天圣广德录》三十卷，合计四百十三卷册，寄回日本。成寻还收集些未刻版印刷的新译经卷和内外典贯，也托赖缘等归国时带回日本了。

如果说北宋时，日本入宋僧已带回大量中国典籍，那么南宋时其数量更远远超过北宋。南宋时代宋僧带回日本的大量经典中，首先应该举出的是福州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是在太祖开宝敕版以后，由福州的东禅和开元二寺刻印的。入宋僧除了带回宋版大藏经之外，还带回一大批佛教的经论章疏，以及禅籍、儒书、诗文集和医书等。仅俊翁自宋回国时所载去的经籍就多达二千零一十三卷。这对促进日本宋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印刷术的成就，特别是竟然带回印本《大藏经》的影响，直接促进了日本刻版事业的发展。自770年以后的二百七、八十年间，日本的刻版事业完全处于中断状态。但从